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 与湘军网络的形成及维系

张晨怡

内容提要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盛于咸同,衰于光绪,是在湖湘理学士人交互往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联结体。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他们认识到仅仅依靠上书言事已经无法挽回统治秩序的衰颓。太平天国起义给他们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通过建立“湘军网络”,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成为支配近代时局变动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晚清 理学 湘军 网络 太平天国

张晨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00081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盛于咸同,衰于光绪,是在湖湘理学士人交互往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联结体,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他们虽然有官位高低、名声大小、学问浅深之不同,但是治学内容与风格、政治价值选择、人际交往圈都具有相同的一面。这一群体深受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世”^[1]传统的影响,将内圣与外王紧密结合起来,既注重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实践,把义理经世作为救时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力行,并最终演化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在湖湘理学士人看来,理学从来不是纯思辨的产物,理学家作为儒家精神的继承者,既然身在秩序之中,便有使此秩序越来越合理的责任,而不可能止于“内圣”。所以只要致力于圣学,必及于政治。这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群体立场。如果在承平年代,秉承湖湘思维方式的理学士人往往并无用武之地,而晚清内忧外患局势的加剧,却为他们发挥经世才干、实践政治理想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2]。

对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王尔敏曾经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清代中叶道咸之际,外患内忧,历年频仍,自为丧乱动荡时期。但亦足锻炼人才,陶铸英豪,使一代俊杰脱颖而出。当时膺此世运者,适以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化视野下晚清理学的流变与价值研究”(编号:14YJC770039)阶段性成果。

[1]钱穆:《罗山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309页。

[2]参见张晨怡:《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学术特征与政治选择》,《明清论丛》第14辑,2014年;张晨怡:《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湘军将帅最为显著,人才联翩而起,勋誉遍及全国,疆吏辈出,分据要津,荣戟纷陈,冠盖相望。可以一见一代盛况。……虽然,世人所见,多在于后世之观成,而忽略创建之艰难。”^[1]事实上,后人忽视的不仅仅是湘军初建时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更易被略过不提的是湖湘理学群体最初的集结过程^[2]。不阐明这一过程,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崛起,而不是其它群体担当了这一角色。而采取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湖湘理学士人的日常人生经历和交往过程上,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

一、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

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中,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为前辈,鼎盛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多有就读或执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的经历,或为师生、或为同学、或为姻亲,彼此关系密切,志向相投。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他们普遍热衷于经世之学。随着时势的日益紧张,他们之间已不再局限于谈经论史,而渐渐趋于谈论时事实务。《南京条约》签订后,刘蓉在覆曾国藩的信中,即有“和议之成,令人愤悒”之句,希望曾国藩“蕴蓄经纶,以需时用”^[3]。而此时,中国大部分的士人尚没有充分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4]。

1850年,咸丰帝即位。登位伊始,即诏谕科道九卿等有言事之责者,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此时,已担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以为国家振兴有望,于是上《应诏陈言疏》,大谈用人的重要性。对于此疏,湖湘士绅争相传诵。刘蓉则以为此疏言犹未尽,没有落实到实处,于是致信曾国藩,称:“大疏所陈,动观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不歉然于怀也。”^[5]好友的来书无疑对曾国藩起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再加上此时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洪秀全的起义军势如破竹。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曾国藩甘冒风险再度上疏。于是,曾氏仿照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尤其对其求言以来的表现,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比诸《应诏陈言疏》的语气温和,《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言辞十分激切。对此,曾国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给友人江忠源的信中写道:“四月又条陈一疏,以圣德咸美而预防其蔽,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第孙托空言,而仆则指实,太伤激切,盖嫉时太甚,忘其语之憨直。”^[6]所以曾国藩上疏之后亦忧亦喜,忧的是可能因此召来不测之祸,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将一众友人的政治

[1]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第159页。

[2]研究晚清理学的代表性成果如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龚书铎主编、张昭军撰写的《清代理学史》(下卷)等,作为理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因是综论性著作,故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虽有涉及,但着墨不多。长期以来,学界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研究多从曾国藩集团、湘军集团的角度切入,如:罗尔纲《湘军兵志》、龙盛运《湘军史稿》、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等。由于曾国藩集团、湘军集团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上述论著虽颇多创获,但多重视湘军成军以后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对晚清湖湘理学士人早期集结时的交互作用关注不够。本文则在拙著《清咸同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对湖湘理学士人集结与湘军网络形成及维系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研究。

[3]刘蓉:《复曾涤生检讨书》,《养晦堂文集》卷四,清光绪丁丑思贤讲舍刊本,第4页。

[4]《软尘私议》,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五),〔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529页。

[5]刘蓉:《与曾涤生侍郎书》,《养晦堂文集》卷五,第9页。

[6]曾国藩:《致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84页。

意见上达朝廷。

从曾国藩与众友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上疏不是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在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朋友支持和推动下采取的。他们彼此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常常互通声气,商议如何能够抓住“得君行道”的机会。这些支持者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所以这件事在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在前期采取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政治行动。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曾国藩个人的要求和政治意图,而是一个团体的意志。因为他们事先通声息,事后作通报,互相鼓动,串联一气,虽然尚且没有像湘军成立以后那样成形,但是的确已经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一个小群体,而曾国藩俨然这个小群体的领袖。在致罗泽南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岑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端也。”^[1]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们怎样全力以赴,希望把握住咸丰下诏求言的机会,革新政局。

毫无疑问,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所以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2]这绝不是曾国藩杞人忧天。奏折送上之后,咸丰帝披阅未毕,即“摔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3],只是由于祁寯藻、季芝昌等大臣为曾国藩苦苦求情,曾氏才免于获罪。这件事大概曾国藩很快就从房师季芝昌那里了解到咸丰帝对他“优诏褒答”的真相。从此,曾国藩再也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因为,他发现不顾个人安危地上疏言事,并不能为挽救统治秩序提供什么帮助。可以说,这次行动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很大。上疏失败,使他们认识到依靠旧有的体制已经无法挽回统治秩序的衰颓,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另起炉灶的机会。

二、湘军网络的最初形成

1852年秋,起于广西金田的太平军,兵锋指向湖南,给晚清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在风声鹤唳之中,郭嵩焘举族避难,与同样率族人避难的左宗棠相遇于湘阴县城东几十里外的玉池山。郭、左二人虽早已相识,但都颇以才情自负,互不相下,所以此前并无太多来往。而此时,二人比邻而居,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话题由眼前的战事说到人物、吏治,几乎无一不谈。对经世之学致力已久的左宗棠发现,自己眼中只知道调弄词藻的郭嵩焘对时局的认识也是颇有见地的^[4]。

山居的日子没过多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来请左宗棠出山。张亮基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事而被咸丰帝从云南调到湖南的,对于战事,他一筹莫展,十分希望有才干的能人相助。于是,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向张亮基急荐左宗棠,称左宗棠“胸罗地图兵法、本朝宪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5]。接到张亮基的邀请,左宗棠颇为犹豫,因为他对张亮基并不了解,不知道入幕以后能否不受掣肘,一展韬略。经过郭嵩焘再三劝说,以及江忠源、胡林翼的来信督促,左宗棠终于决定出山佐幕。

除了左宗棠,曾国藩的首次出山,也与郭嵩焘力劝有关。1853年初,在家为母守丧的曾国藩接到张亮基快马送来的咸丰上谕,诏令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此时的曾国藩守制不到半年,因此他

[1]曾国藩:《复罗泽南》,《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79-80页。

[2]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12页。

[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页。

[4]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第3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5]胡林翼:《致张亮基》,《胡林翼集》(二),〔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5页。

虽然有出山经世之意,但是担心被讥评为虚伪与不孝,有损自己理学后起之秀的名声。于是在接到诏书的次日,曾国藩就草就辞疏,准备托张亮基向咸丰帝代奏。正在此时,郭嵩焘受张亮基之托,星夜赶往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经从戎,古之制也”^[1]。为全孝道,郭嵩焘又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出面劝子承办团练。于是,曾国藩在母亲灵前烧毁辞疏,遵旨起行,来到长沙,在罗泽南、王鑫、刘蓉等人创办的湘勇的基础上办理湖南团防。这一决定也成为曾国藩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如果不是投笔从戎,曾国藩即便官位再高,声望再隆,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唐鉴,只能在理学的传承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就在曾国藩被郭嵩焘劝出山不久,郭嵩焘也在老友江忠源的劝说下投笔从戎了。早在咸丰帝下诏办团练之前,丁忧在籍的江忠源已经在家乡新宁招募楚勇,与太平军交锋多次。1853年初,因在作战中不惜死力,江忠源被清廷授湖北按察使衔,并帮办江西军务。这个新职,实际上是将江忠源推到了一个更为险恶的位置上——太平军由江西回攻湖南的最前线,因此他迫切需要郭嵩焘的帮助。所以郭嵩焘刚从荷叶塘曾家赶回家中,就见到了江忠源的邀请信。郭嵩焘回信推辞,不久,江忠源再次遣使传书,要他为国家大计着想,信中说:“兄纵不为弟出,独不为天下计邪?”^[2]于是郭嵩焘再也没有理由推辞,只好出山“经营国计、保卫地方”^[3]了。

自此,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相继乘时而出,他们“先之以友朋,继之以昏姻,俨然成一集团。及夫太平军踰岭而北,彼等皆际会风云,展其骥足,足为理学吐气”^[4]。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抉择凝聚在一起终于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崛起与太平天国起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太平军兵锋逼近湖南,给晚清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地区甚广,“两广两湖及苏、浙、皖、赣同被兵劫,起而与太平军抵抗者,官兵之外,即为各地绅士”,“各地绅士遭遇相同环境,而在此环境中奋斗以出,独创一种军制风格及重要之军系集团者,只有湘军”。所以说,“时势环境固然重要”,作为实践主体的湖湘理学士人的“志趣、节操、胸怀、眼光”,以及他们的组织形式更为重要^[5]。而湘军网络作为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也自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罗尔纲所说:他们“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儒学来指挥作战”^[6]。据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骨干成员约475人,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人,其中治汉学、公羊学者少,宗奉理学者多^[7]。在湘军网络中,这批湖湘理学士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多元关系”,既存在着空间关联,如同乡关系;又存在着行为的互动关系,如朋友关系;还存在着正式关系(权威关系),如上下级关系。而且关系是不断流动的,很多事件就在关系中发生。

三、湘军网络的维系

湘军网络形成不易,维系更难,能否实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领袖的凝聚力。因为对于一个网络来说,其中的领袖人物如果能将其他成员都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网络往往具

[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

[2]江忠源:《致郭筠仙书》,《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清同治癸酉刊本,第21页。

[3]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清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刊本,第4页。

[4]陆宝千:《刘蓉年谱·自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1页。

[5]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第1页。

[6]罗尔纲:《论湘军》,〔太原〕《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

[7]参见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2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有较高的团结性。曾国藩虽然是“这批书生的核心人物”^[1]，但在湘军网络中，却并非一开始就处于中心位置，他在网络中的地位也是逐步形成的。王尔敏曾评价说：“江、曾、胡、左四位领袖，构成湘系发展核心，自为事后可见之结果。实际湘军中其他人物，决非不可能成为核心分子，然世势变化纷乘，人事际遇有别，战争酷烈，兵将出入白刃，身冒锋镝，不知使多少英雄豪杰饮恨而终。”^[2]

在湘军建立之初，江忠源曾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成为晚清湖湘理学士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江忠源资历虽然比较低，但因在蓑衣渡一战而击杀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而声名鹊起。晚清湖湘理学士人无不对江忠源寄予厚望，即使名位资历远远胜过江忠源的曾国藩，也计划练勇万人交给江忠源统带，并推许江忠源为湘军事业的领袖。曾国藩以长者身份甘居辅佐地位，可见这群理学士人对理想抱负的追求远胜过权位名分，这也是湘军网络能够紧密结合的一项重要条件。不过，江忠源虽然以知县累功升擢安徽巡抚，但是不久就阵亡于庐州，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最初计划只能重新加以修订。

江忠源歿后，曾国藩在致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写道：“侍十三夜接寄谕，知岷樵殉难，心绪万分作恶。侍所以办理一切，规模宜大、条例宜明者，意将交付此人。以渠为大帅，而以侍参酌其间，或有小补耳。今斯人既亡，侍之精神、才力、度量、阅历四者，皆不可以为大帅，而浪得虚名。”^[3]情势所迫，曾国藩虽然自认为不知兵事，但是因为任职京师多年，早已成为湖湘士人的政治代言人，自然只好走到前台充当领袖，与他关系密切的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挚友对他无不鼎力支持。而这种支持并非是颂以空言，也非盲目服从。曾国藩后来曾经对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诸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4]对自己有这样肝胆相照而又具有独立意识的挚友与部属颇为得意。

在湘军网络中，比曾国藩崛起时间稍晚，但是却比曾国藩更具人望，与曾国藩相得益彰的核心人物则是胡林翼。1853年底，应湖广总督吴文镛等要求，胡林翼率黔勇进入湖北，是为胡林翼投入湘军事业之始。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湘军中第一个获得封疆大任的是江忠源（清咸丰三年）。次年，清廷又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随即收回成命。因此，胡林翼虽然是湘军中第三个获得巡抚之职的人物，但是任期长久，充分发挥了封疆大吏所能起到的作用。当时，胡林翼集湖北政、财、军大权于一身，比曾国藩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成为湘军网络的灵魂人物。

由于“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5]，使胡林翼赢得了比曾国藩更高的人气。虽然如此，胡林翼为了集团的整体利益，并无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集团最高领袖之心。深知曾国藩难处的胡林翼，出于公义私谊的原因，还积极为曾国藩谋取地方实权。1857年，曾国藩以父丧离营，廷旨准假三个月，随即迭次催促，命其重返江西前线，而所予之职，仍是并无实权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因为此前仰食江西时受尽掣肘，为免再度客位虚悬，于是具折向咸丰帝讲明要“位任巡抚”，否则绝不出山。谁知咸丰帝竟然顺水推舟，同意曾国藩在家守制。为给曾国藩再出提供机会，胡林翼借口浙江危急，奏请起用曾国藩督师赴援。但是，没有地方职权的曾国藩始终被朝廷视为游击之军，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全盘崩溃，清廷四顾无人，只得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逾月实授。曾国藩带兵七年，备尝艰辛，终于获

[1] 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437页。

[2] 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第7页。

[3] 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55页。

[4] 曾国藩：《复李鸿章》，《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862页。

[5] 曾国藩：《加左宗棠片》，《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227页。

得地方实权,这当然离不开胡林翼的鼎力支持。据曾国藩身边的朱孔彰记述:“江南大营复陷……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1]可见,对于曾国藩就任江督一事,曾、胡、左等人曾有过一番精心谋划。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胡林翼的苦心护持,也没有湘军网络最后一位领袖左宗棠的崛起。早在湘军建立之前,左宗棠因胡林翼之荐,已经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延入幕中执掌军机,一举筹划了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后来,左宗棠因樊燮案几乎丧命,幸得胡林翼、郭嵩焘全力搭救。1860年,左宗棠被清廷赏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但是左宗棠恃才傲物,经常讥刺曾国藩“于兵事终鲜悟处”^[2]。因此,虽然曾国藩赏识左宗棠的才干,但是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胡林翼洞悉曾、左私衷,便恳切地劝说曾国藩:“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3]在胡林翼的调解下,曾国藩只好暂留左宗棠襄办军务。不过,曾左两人在事业上虽然能够彼此合作,但是相处得并不融洽。于是,曾国藩干脆顺水推舟,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乃至浙江巡抚,使左宗棠终于如愿以偿,独当一面。

可见,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经营湘军事业的过程中,矛盾冲突始终一直存在,若无共同的政治理想为基础,早已分崩离析。据载,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所送挽联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4]既不避讳两人之间的矛盾,更表明了二人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左宗棠也写道:“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晒耶?”^[5]可见曾左二人所争持的主要是原则,而不是权力与名位。的确,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由分散走向统一,个性的碰撞,细节的分歧,都在所难免,只有在不违背理想的前提下求同存异,才能使事业不断发展。而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也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又为他们进一步实现理想提供了潜在的动力来源。

湘军网络的建立基础,最根本的在于这些湖湘理学士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对时局政事的一致认识。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王鑫等人的文集中,重建理想社会秩序、卫圣道、挽世运之类的言论屡见不鲜。虽然这类目标比较高远,实际上缺少约束性,但是却可以使他们始终维系崇高的志节。至于对时局政事的认识,因为各人均多少有切身的感受,更成为促进改革思想形成的实际动因。因此他们之间的具体意见即使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建立在纯正学养之上的政治理想,却是他们结合的共同条件。就这样,在“湘军网络”中,个人感召力、同乡、师友、姻亲等关系与上下级的外在强制性规条错综复杂的交织融合,使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以组织化、结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利用地方宗族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网络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最终成为支配近代时局变动的关键因素。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治理念,也终于有机会从地方逐渐放大到全国。

[责任编辑:肖波]

[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7-8页。

[2]左宗棠:《致胡林翼》,《左宗棠未刊书牍》,〔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7页。

[3]胡林翼:《致曾国藩》,《胡林翼集》(二),第614页。

[4]左宗棠:《挽曾文正公》,《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85页。

[5]左宗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68页。